

丝绸之路史前史

◎ [俄] 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 著
(Elena Efimovna Kuzmina)

◎ [美] 梅维恒 英文编译
(Victor H. Mair)

◎ 李春长 译



科学出版社

新疆文物保护研究丛书（丙种本之二）

丝绸之路史前史

〔俄〕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 著
(Elena Efimovna Kuzmina)

〔美〕梅维恒 英文编译
(Victor H. Mair)

李春长 译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字: 01-2014-5990

丝绸之路史前史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by E. E. Kuzmina

First edition 200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ISBN 978-0-8122-4041-2

Copyright©2008 Victor H. Mair. All rights reserved.

内 容 简 介

本书结合气候、地理、环境变化、历史、考古等多个学科知识,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特别是作为游牧和游牧经济发展的首要工具——马的驯养、马车的起源及发展历史,结合众多资料确定了游牧经济的起源地,游牧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情况,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群在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迁徙、商品的运输和贸易情况,中亚东西部和欧亚草原人群的相互关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史前史/(俄罗斯)库兹米娜著;李春长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 10

(新疆文物保护研究丛书. 丙种本; 2)

书名原文: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ISBN 978-7-03-045992-3

I. ①丝… II. ①库…②李… III. ①西域-地方史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4944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赵 越/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肖 兴/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字数: 460 000

定价: 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梁 涛

编 辑：彭 杰 包 宾

叶 卫 赵 岩

“新疆文物保护研究丛书”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总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8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是我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

新疆历史悠久，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地段，是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交融荟萃之地。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中原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和融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璀璨的优秀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底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美丽的阿尔泰山、巍峨的昆仑山、雄伟的天山以及干燥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形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自然地貌和环境，雨量稀少、风沙诸多、气候干燥，这些特殊的气候特征，为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新疆拥有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的文化遗存，都极为丰富，有“天然博物馆”之称。据统计，截至2012年，新疆已发现各类文物点400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6处（含第七批待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75处（含第七批待批），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余处；各级文物收藏机构现有各类馆藏文物3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07件，二级文物1339件，三级文物4038件。此外，还有大量的未定级文物点和一般文物。

新疆作为中国境内涉及世界文明史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地区，其文物资源真实地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真实历史见证，是维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精神纽带。它们对于

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持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历来是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物自身所具有的客观性和直观性,使其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新疆大局稳定的斗争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和积极作用,尤其是对新疆各族群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阐明“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同时,作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人文景观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的文物资源分布广、种类全、数量多、内涵丰富,极具展示和观赏价值,已成为拉动新疆的旅游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所以,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保护工作者带着强烈的责任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克服种种实际困难,筚路蓝缕,长期奔波在条件极为恶劣的辽阔大地上,书写了新疆文物保护事业从起步、成长到逐渐壮大的历程。

1989年6月,新疆文化厅克孜尔千佛洞石窟维修办公室成立,隶属于自治区文化厅。1992年3月,更名为“新疆文化厅文物保护维修办公室”。2001年7月,更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在不断前进的历程中,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立足新疆,放眼西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先后在区内外主持承担了一大批文物保护项目,在全国文物保护行业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尤其是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以中心主要业务人员组成的新疆重点文物保护项目领导小组执行办公室,组织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物保护行业的重大系统工程——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十一五”期间总投资额达4.7亿元)。该项目的多个子项目被国家文物局评为样板工程。其中,交河故城二期抢险加固工程名列“2010年度全国文物保护十大工程”之首,柏孜克里克石窟抢险加固工程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文物保护十大工程”,高昌故城三期抢险加固工程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最佳文物工程”。2011年,中心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典范单位”。2012年,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已成为目前新疆唯一拥有国家文物保护勘察设计甲级资质和施工一级资质,集产学研为一体的科研单位,主要业务范围包括

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和文物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以及区域性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文物信息咨询、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新疆文物保护》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等。

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切地感到，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过程同时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过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在全面系统收集整理基础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新疆文物保护研究丛书，以期不仅为文物保护工作者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借鉴，而且为关注新疆文物保护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个从多层面了解新疆文物保护工作的窗口。根据工作实际，本丛书拟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系列。其中，甲种本是规划、勘察设计方案の汇集，乙种本是文物保护项目的工程报告及监理报告，丙种本是文物保护研究的中文著作及外文译著，丁种本是文物保护研究的中文、译文及外文论文的汇集。集腋成裘，堆沙为塔。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为新疆文物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2012年5月

中译本序

我知晓《丝绸之路史前史》这本书，是在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阅览室查阅中亚考古资料的时候。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爱不释手，因为书的内容比较精湛，文献资料翔实，涉及了大量有关中亚考古的资料，包括中文文献和俄文文献，还有英文和法文文献。由于是外文资料，我就挑了重点内容复印（尽管我不懂俄语等语言）。然而，看了几次后，我复印了整本书。

回到新疆以后，我就把这本书的内容简单地给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吕恩国先生介绍了一下。他非常高兴，也想看看这本书，可是他懂的是俄语，又找不到俄语版本（后来得知俄文原稿并未出版），就让我把大概内容翻译一下，于是我就简单地翻译了一下。而到2012年，我再次翻阅此书的时候，把以前的初稿拿出来对照，并与吕先生说了一下，索性把这本书全部翻译出来。后来我们希望能找到《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俄文版，遂与编译此书的梅维恒先生联系，才得知，英文版是直接从俄文原稿翻译过来的，俄文稿并未出版。我只能作罢。当我们要求翻译此书时，梅维恒先生欣然同意，并且借着来新疆考察的机会还约我在乌鲁木齐见了面。交谈期间，他担心我的英文水平，还提及翻译此书的很多难点，特别是地名及相关名词的转写。我心里忐忑不安，但还是想继续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正如梅维恒先生所说，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一方面因为自己的英文水平确实有限；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知识面狭窄。在名词的转写中，困难重重，除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外，还参考了俄汉名词词典，同时，借助于互联网技术，查阅了好多与中亚考古研究相关的文章，采用和借鉴了文章涉及的名词翻译。即便如此，在遇到转写名词的时候，还是拿捏不准，例如，Olgina与Ol'gino，同一个地方，书写方法不一样，在一个地名翻译过程中，因为转写的方式不同，或者俄语的格不同，一个地名出现了名词、形容词等格，如“Novonikolskoe”“Novonikull'skoe”

“Novonikolskye” “Novonikolskoye”，在此则统一译为“新尼科利斯科耶”。在涉及环境气候专业名词上，遇到一个大的问题，如“Hadjibek regression of the Black Sea”，就很难解说，请教了古环境古气候方面的专家后，得知这个词应该是黑海地域以一个小地名命名的一次大海退事件。翻译期间有几次真想作罢，但是，对此书我还是情有独钟，正如梅维恒先生所说，此书的参考文献也是不可多得资料库，有助于学界借鉴东西方研究方法和资料。

梅维恒先生在2012年夏天给我们寄来了本书的英文版，接下来又按照我们的出版要求，寄来了允许我翻译出版的授权书。

后来，我因借调到“‘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办公室工作，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这里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完成，并在主任梁涛研究员和彭杰研究员的鼓励和支持下，以及韩明、包宾等同事的帮助下，完成了此书的译校工作。在出版过程中，科学出版社的孙莉女士和赵越女士也给予大量帮助，对汉语翻译中的错误等问题给予悉心指导和校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和本人水平有限，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正，有机会再版时不断修正。

李春长

英文版编者话

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的《丝绸之路史前史》是一部重要著作。我因能为此书的问世助一臂之力而感到荣幸。当然，许多人对丝绸之路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不得不等待库兹米娜博士论述和分析丝绸之路形成先决条件的这本书。她描述的内容令人着迷，几乎覆盖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的整个欧亚地区。

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几次会议上见到库兹米娜博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她具有渊博的中亚青铜时代文化知识。我拜读了她的大量著作和文章，特别是《印度-阿兰人的由来》[*Otkuda prishli Indoarii? (Whence Came the Indo-Aryans?)*]，更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她熟练地运用包括印欧人(Indo-Europeans)(特别是印度-伊朗人)早期向东扩张在内的大量考古学资料。于是，我在1997年前后征询库兹米娜博士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写一本关于丝绸之路史前史方面的专著。因为尚无人尝试对历史时期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几千年间整个中亚形势进行系统研究，所以此项工作迫在眉睫。当库兹米娜博士同意我的请求后，我自然感到非常欣慰。

从根本上说，《丝绸之路史前史》是一部重构历史的著作，同样亦是对田野考古工作的补充。虽然这两种方法是用来解决不同问题的，并且在使用的時候也相互独立，但对于正确甄别史前史研究中的一系列争端至关重要。

库兹米娜的专著既很好地总结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研究传统，同时也升华了该历史传统。她的工作根植于一个特殊的苏维埃学术体系，其现在的焦点着重于人类学和历史学术研究。然而，对于库兹米娜博士来说，《丝绸之路史前史》不仅仅是苏维埃学术体系的实例，也是她熟知西方研究方法和出版资料的例证。她在各种讨论中吸收和利用了西方研究方法和出版资料，但是没有动摇她的学术根基。目前，本书代表着俄语和西方语

言学界在过去研究欧亚草原上迁徙和交流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公正地说，它源自于18世纪所提及的丝绸之路研究核心问题的最基本调查研究。库兹米娜博士拟定的项目绝对是个奇迹，其取得的成绩也同样非凡卓越。

总体来说，本书的思想观点源自不同的知识体系（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因而，这是对多年来一直在多个领域备受争论的历史文化的重建；而库兹米娜博士自己也参与了这些争论达50年之久。

也许库兹米娜博士这本书对英文读者最有益的地方并且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应对多种学术背景下形成的观点。例如，对于俄罗斯学者（在这件事上，中国学者也是如此），说到人种进化、基因遗传关系，甚至种族，都非常自然；而这些话题在美国人当中或多或少是个敏感话题，并且由于目前西方研究者通常不考虑体质人类学研究，这类话题自然而然地就遭到普遍拒绝。此外，因为目前西方学者通常忽视了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常见的人类体质特征的形态学分析，我也不得不适当地调整提出此类问题的方式。例如，当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谈到基因库时，他们非常关心所提及的长头型人种和蒙古人种。然而，当尽可能地忠实地保留库兹米娜博士的言辞和资料时，我也经常选择一些委婉的方式以防止偏离主题或者令讨论的主题晦涩难懂。类似地，我也经常把库兹米娜博士对于“部落”“人群”“族群”或者同类语的使用替换掉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例如“生产型经济”。这种术语对于美国读者而言更容易理解。为简单起见，我保留了重复出现的“farmer（农民）”一词，而没有将其替换为更繁缛的“agriculturalist（务农者）”或基于史实却并不那么准确但更常见的词“peasant（乡下人）”。至于库兹米娜所使用的“barbarians（野蛮人）”，我并没有替换，因为她将这个字的特殊用法具象为非贬义的“出现于定居者中的入侵群体”。我还发现，保留“car（车）”和“cattle（牛）”的古老而通用的用法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方便的。更进一步说，俄罗斯（苏联）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有他们自己详尽的系统去断代、测年和判定时期。就这一点而言，我并不愿意在库兹米娜博士的作品中作任何修正，因为我相信，它对于西方学者去理解俄罗斯（苏联）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

库兹米娜博士因其在史前欧亚草原研究上的渊博学识，在此类研究上比其他健在的学者掌握更多的文献。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她所掌握的非俄语资料和俄语资料同样令人惊叹。因而，仅参考文献就使《丝绸之路史前史》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料库。

库兹米娜博士在此书中还梳理了大量迄今为止仍然模糊而晦涩的议题争端。例如，

她筛选大量有关最早轮式交通工具的分散资料，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第一批双轮马拉轻型战车的产生并不在此前所认为的美索不达米亚，而在黑海周围的南乌拉尔和东欧大草原。她列举了令人叹服的考古学证据证实了游牧业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向东亚大陆核心区西北边缘传播的事实。这个证据完全与绵羊身上古DNA研究的最新成果相匹配。库兹米娜博士在本书中的另一杰出成就则是建立中亚青铜时代文化的序列，以及与欧洲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地区在生态、文化和艺术方面都具有多样性。对库兹米娜博士来说，最了不起的是将这广阔的时空置于统一分类法中并将其看成一个整体来认知。同样，作者也综合了大量的有关气候、地理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其中有许多是迄今为止不可多得的英文资料），将它们整合成简洁而完整的专著。这本书因其丰富的材料而毫无疑问地吸引了一部分读者的关注。然而，我们对青铜时代中亚的丰富理解肯定使这部杰作物有所值。

参阅《丝绸之路史前史》的读者要想最大限度地理解这本书，必须要熟悉诸如降水和全新世等气候术语，或者主动查阅大量地图，寻找广大地区的地理位置。读者遇到不熟悉的考古学专业术语，可参考马洛里（J. P. Mallory）和亚当斯（D. Q. Adams）等人的《印欧文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1997)]。这本书的资料既新颖又权威。

我很自信，那些沉迷于丝绸之路历史或中亚史的人将会在此书中找到有价值的资料。库兹米娜博士具有独特的能力去收集大量的考古资料，并整理成连贯而令人信服的形式，这种能力将证明，它对不同领域和背景的读者都是有益的。考虑到这一点，我很乐意将此大作介绍给此领域的专家和门外汉。

马洛里、狄宇宙（Nicola Dicosmo）、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邦克（Emma Bunker）、奥尔森（Sandra Olsen）、鲁宾逊（Karen Robinson）、白若思（Kostislav Berezkin）、斯托奇（Tanya Storch）和罗伯斯（Paula Roberts）在各个阶段审校整部书稿，并因他们的审校不断地提高了本书质量。另外，安东尼（David Anthony）爽快地解决了特殊技术问题，还校对了书稿。Claudia Chang给予我特别大的帮助：她凭借中亚考古调查的丰富经历和对此领域俄文出版物的熟悉，仔仔细细地通读了全篇手稿，对本书的准确性和习惯用语表述做出了贡献。最后，苏珊·多夫（Susan Dorf）和诺琳·奥康纳-亚伯（Noreen O'Connor-Abel）在准备出版此书时对手稿进行了大量修正。我深深地感谢对出版此书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的所有人。

最后，我希望此书将成为向英语世界介绍俄罗斯关于中亚研究系列著作中的第一本。考虑到中亚的日趋重要性，除俄罗斯学者外很少有人深入到此项研究的丰富的俄语学界，这着实是一大憾事。俄罗斯在中亚研究中无出其右，而那些不懂俄语却将广泛使用这些资料的群体正迫切需要这些资料。库兹米娜博士这本代表作的内在意义和高水平恰恰是一个开始，但我由衷地希望这并不是最后一本。

梅维恒

英译本转写说明

翻译和编辑本书中最难的两个工作一直是俄语转写及其转写体系的多样性，以及对罗马字转写俄语术语和人名缺乏广泛的认同标准。一般来说，我尽力遵循俄罗斯同仁推荐的转写体系，但是，也经常因下面的情形而复杂化，有许多术语在英语文献中被广泛接受，但是在更加严密的拼写体系中则采取另外一种形式[例如*dar'ya*（代替了*dar'ya*）、*Tripolye*（代替了*Tripol'e*）、*Afanasievo*（代替了*Afanas'evo*），等等]。在这些情况下，我经常保留常见的英语拼法来避免熟悉后一种拼写的读者混淆。我们在此书的翻译中，联合了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美国地名委员会（U. S. Board on Geographic Names）、哈佛大学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 at Harvard University）等部门。我们做此事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英语读者对这些拼写听起来和读起来更自然，也是为了避免过量的识别工作。在碰到专有名词（人名和地名）和专业术语固定拼写时，我们通常遵从习惯，而非教条地遵循某一条规则。

更具挑战的是，俄语中出现的源自汉语、维吾尔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术语名词则成了转写的另外一系列问题。例如，汉字的俄文（即西里尔语）转写在处理汉语的音素音位上与处理英语不同，所以通常很难判断正确的英语音译，除非确切知道俄语中已规定的准确的人名、地名或术语。我因为熟悉库兹米娜博士提及的大部分遗址和文化，所以通常能够辨认出她所用的双重转写。然而，我有时候也不完全确信汉语、维吾尔语和其他名称及术语的原形。在如此情况下，我也简单地用罗马字母处理西里尔语转写。

我们到目前为止，同样用罗马字母（法语、德语和英语等）以不同的方式来转写汉字。对于采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发音的转写系统比较多。当把这些注音转换成西里尔语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复原现代汉语普通话所表达的原意。但是，我们尽可能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汉字读音转换成汉语拼音。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希腊、拉丁、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等名词和术语的西里尔形式转写成罗马字母的工作中。在能力范围内，我们就会尽力地把这些名词和术语转写成英语中大家最熟悉的形式。

梅维恒

引言

近年来，公众对中亚远古史的兴趣与日俱增。生活于广大区域内的古代中亚人对全世界文明史的贡献如今得到了广泛认同^①。

“伟大的丝绸之路”在旧大陆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现象，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和欧洲之间建立了一条贸易之路。这条路还可延伸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地图1）。商人们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贩运丝绸，反过来，也从罗马和其他国家运送琉璃、珠宝和其他高档奢侈品到中国。

千百年来，就是这条路见证了人群迁徙、货物运输和思想传播。民族迁徙、起初偶尔的物物交换及后来大型商队的贸易、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的传播——所有这些成就均是欧亚不同人融合为一体的大潮中的一部分，推动着旧大陆的一体化进程。

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穿过了欧亚草原地区（例如今天的乌克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地区的人群都是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和中介人。这些联系是何时何地建立的，并且是沿着哪些线路开展的呢？

欧洲早期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并没有意识到旧大陆的存在，他们所了解的地理范围东部仅达印度西部。赫卡塔埃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公元前6～前5世纪）的《环球航行》（*Gesperiados*或者*Periegesis*）、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导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作品没有提及中国。对他们来说，从印度起向东的其他地域都是不为人知的外海；甚至亚历山大图书馆（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公元2～3世纪）的著名地理学家和馆长埃拉托

① 英文编者注：引言对回顾有关“移动放牧”的研究尤为重要，特别说明了波斯人的角色。西方学者在讨论丝绸之路形成时经常忽略了波斯人作为先驱的作用。

色尼 (Eratosthnoes, 公元前3 ~ 前2世纪) 的《地理》(*The Geography*) 也未记载过中国。然而, 与此同时, 有关居住于伊朗北部、奥克斯河 [Oxus, 又叫乌浒水, 也叫阿姆河 (Amu Darya)] 和药杀水 [Jaxartes, 又叫锡尔河 (Syr Darya)] 人群的记载逐渐增多, 以及巴克特里亚 (Bactria) 骆驼和索格底亚那人 (Sogdians), 也涉及了他们北部近邻活动于中亚边缘直到多瑙河 (Danube) 游牧民族斯基泰人 (Scythian) (A. M. Petrov 1995; Pyankov 1997)。也就在公元43年, 罗马地理学家梅拉 (Pomponius Mela) 在其著作《德斯图奥比斯书 (第三辑)》(*Desitu Orbis libri III*) 中记载了赛里斯 (Seres, 希腊语指中国) 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被称为丝绸国家的人 (源自拉丁语 “sericum”, 即 “silk”), 位于印度北部, 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东部 (A. M. Petrov 1995, map 13)。伟大的丝绸之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于公元4世纪早期的马塞林 (Ammianus Marcellinus) 的《历史》第23册中。

然而, 此条著名路线的开通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事情。那时, 中国统治者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其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 描述了穿行整个塔里木盆地和翻越天山的情况, 以及繁荣的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和费尔干纳 (Ferghana) 国家的富有。在那里, 他看到了金色高大的汗血宝马 [动物学家已经确定这些马都是尼萨种 (Nisaeen), 是安德罗诺沃 (Andronovo) 文化良马的后裔和现代汗血马 (Akhal Teké) 的祖先]。出自伊朗梦幻神话中马的传说, 在中国神话中一直流传了下来 (Kuzmina^① 1977a; 见参考文献)。为了得到这种绝世良马, 中国统治者随后就派遣他的使团去费尔干纳, 随后发动了数场血腥的战争。

但是, 张骞出使的主要结果在于开创了丝绸贸易。李希霍芬在1877年重新将运送丝绸的这条线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die Seidenstrasse*) (Richthofen 1878: 454), 从而把中国与西亚、印度, 还有欧洲联系在一起。

基于中国编年史和古代作家的证据, 例如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 VI: 53 ~ 54], 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Periegetes, 《希腊次地理》(*Geographici Graeci Minores*), Vol. 2: 1864] 和托勒密 [Ptolemy, 《地理》(*Geography*), Vol. VI: 15, 1 ~ 3; 16, 1 ~ 8; Vol. VIII: 24] 的记录, 几代学者的努力有助于确立丝绸之路北道 [Ritter 1837; V. V. Grigor'ev 1873; Tomaschek 1888; Stein

① 英文编者按: 参考文献中引用 “Kuzmina” 时, 没有名首字母缩写的即指 “E. E. Kuzmina”。